

俄國漢學家李福清的治學方法

李明濱

提要：作者與俄國漢學家李福清院士多年交往，目睹李福清院士不斷獲取重要學術成就，深諳其治學特點，作者強調其注重小題大做、田野調查和比較研究的三種方法，並有實例介紹。

關鍵詞：李福清 俄國 中國民間文學 治學

今年（2003 年）12 月 22 日，俄聯邦科學院李福清通訊院士接受我國政府教育部授予“中國語言文化友誼獎”。這是授予國外最爲傑出的漢語教育工作者和漢語語言文化研究者的專門獎項。李福清是俄羅斯第一位獲此殊榮的人。

一、獲獎業績

回顧具有三百年歷史的俄國漢學，若從 19 世紀初葉趨於成熟算起，則大體經歷了四個時期。每個時期各有一位成績卓著的學者爲標誌。前三個時期依次出現的是俄國漢學史上三個劃時代的人物：雅·比丘林通訊院士（1777—1853）、瓦·瓦西里耶夫院士（1818—1900）、瓦·阿列克謝耶夫院士（習稱阿翰林，1881—1951）。他們分別代表 19 世紀上半葉、19 世紀下半葉和 20 世紀上半葉的最高成就。

至於第四期，即 20 世紀下半葉，情況已大不相同。俄國漢學有長足的進展，全面發展，名著如林；人才輩出，燦若星辰。單計漢學界的科學院院士就有 3 位，分佈在史學、政治學和文學領域，通訊院士 4 位。因而標誌性的人物很難定於一尊（比如前三個時期僅各有一位院士或通訊院士而已）^①。

不過就文學領域而言，雖然俄國研究中國文學者衆多，知名度高者也不在少數。但李福清通訊院士仍屬於群雄中之翹楚^②。

李福清氏從民間文學開始，逐步擴展研究領域至俗文學、古典文學，進而中國傳統文化。發表過一系列論著，其中主要的著作《萬里長城的傳說與中國民間文學的體裁問題》、《中國的講史演義與民間文學傳統——論三國故事的口頭和書面異體》、《從神話到章回小說》業已全譯或部分譯成中文。還有直接出版的中文著作《中國神話故事論集》、《李福清論中國古典小說》、《關公傳說與三國演義》、《從神話到鬼話——臺灣原住民神話故事比較研究》（社會科學出版社的增訂本改題爲《神話與鬼話》）。

同時，他爲了研究工作而開展的資料搜尋也富有成果，發現古籍新版本，連帶編出不少相關的學術研究書目，資料翔實豐富，其成績甚至得到中國同行的讚譽，也爲後來

的研究者提供了方便和依據。

在專著以外，當然還有數量巨大的文章。近期出版的中文本《古典小說與傳說（李福清漢學論集）》（中華書局，2003年）則是從他的文章和著作選編出來的篇目並經作者親自審定，可說是他的代表著作。

李福清研究中國文學的成就傑出，對漢學的貢獻巨大。主要的可以概括為四個方面：（一）其研究涉及中國文學的各個領域，從古典文學到現當代文學，乃至整個中國文學的研究，都廣有建樹。包括翻譯、介紹、輯錄、評論和闡釋，他對中國文學的理解是創造性的，用比較的方式來分析中國小說，角度獨特，提法新穎，很有內容。作家王蒙稱讚李福清對中國古典小說的傳統技巧在當代小說中的運用，分析得細緻精當，有些議論則發前人所未發，甚至超過了中國同行^③。（二）中國民間文學和俗文學，始終是他研究的一個重點，不斷探索和闡明的對象，其成績尤顯突出。其理論所涉及的領域，有些在我國的同行中也頗感生疏。著名民間文藝學家鍾敬文教授認為，李福清提出許多民間文藝學上的問題，有的中國民間文藝學者或不曾想到，或未曾涉及，可說已成為他獨特的一家之言了^④。（三）對臺灣原住民文化的研究，將之同大陸各族文化作比較分析。李福清氏近期在研究工作上更為辛苦，因而在成績方面也更上了一層樓。他本來對臺灣原住民並不瞭解，在60歲之後還不辭辛苦到當地去做田野調查，深入布農族等少數民族地區中去訪問、採錄，搜集到大量素材，仔細整理，反復對比和分析研究，取得了超越前人的巨大成就。他也是超越了自己以往的研究路子，不僅僅是依靠書本的和典籍的資料，而是注重於田野調查，這正是他有別於當代其他俄國漢學家而獨樹一幟的重要標誌，也是繼承前輩導師阿翰林深入實地調研優良傳統的體現。（四）中國民間藝術研究。他非常熟悉中國民間藝術，研究卓有成效，不僅在論著中大量引用歷代民間藝術，包括石刻、畫像磚、墓雕、壁畫、帛畫、神像、戲劇道具、各種插圖等，而且注重搜集並整理中國年畫資料，開展專題研究。其搜集中國歷代年畫的範圍不但有俄國的，而且遍及日本、德、英以及捷克、丹麥等國家，重點在中國已失傳的年畫，所獲的種類和數量也是驚人的。艱苦的勞作造就了他敏銳和準確的鑒別力，其所編《蘇聯藏中國民間年畫珍品集》^⑤就是從5000多幅舊年畫中挑選出來的200幅在我國已失傳的珍品，最能說明他在年畫研究上的功力。如今該書已在世界各國受到重視和珍藏，在中國大陸有的年畫博物館還盛情請他當顧問，而臺灣還有民間藝術博物館擬延聘他去當館長。李福清氏在年畫研究上繼承了阿翰林的傳統，並且在許多方面有了創新。

中國文學之外，像日本、朝鮮、越南、蒙古等國文學，李福清也有評論和介紹，這從《古典小说与传说（李福清汉学论集）》一書所附作者著述目錄都可以看得出來，因而可以說他已超出漢學研究範圍，足可稱為東方學家了。

我同李福清先生交往數十年，讀過不少他惠贈的著作，深感其研究方法獨具特色。他運用俄羅斯文學、文化理論，乃至歐洲的文學理論來研究中國文學，尤其是將俄國的歷史詩學理論、系統研究和比較分析的方法引進到中國文學研究之中，尋找到一條適合於研究中國文學和文化的路子。這自然使他的研究別開生面，當然也為我們的學術研究提供了經驗，可資借鑒。

李福清先生的特色，正是把俄國歷史詩學傳統運用於中國文學的分析和研究，從而

形成鮮明的個性。關於其個性，十多年以前我國民間文學研究專家、中國社科院文學所馬昌儀研究員曾經做過概括地描述：（一）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反映論，以馬克思恩格斯的原始文化理論為依據。（二）重視系統研究。內容與形式關係密切，根據不同的研究對象，採取不同的方法：結構論、符號學、統計學等等。（三）遵循歷史詩學原則，把在發展中研究（歷時的）與在聯繫中研究（共時的）有機結合起來。（四）從詩學的、審美的角度研究文學，強調文學的社會功能和認識功能。（五）學風嚴謹，重視資料工作^⑥。

二、治學方法

其中，值得提出他的學術研究方法，特別是小题大作（即深廣開掘）、比較研究和田野調查三種方法。

（一）小题大作

李福清師承俄國著名民間文學理論家普羅普的傳統，尤其銘記導師契切羅夫的指導：“選題要小，開掘要深”，也就是小题大作，從研究工作一開始，就精選題目，注意集中明確，避免籠統和作泛泛之談。他的第一部專著《萬里長城的傳說與中國民間文學的體裁問題》（1961）^⑦，就是把孟姜女故事久遠的傳說資料，依照古代、近代、現代的歷史脈絡梳理下來，並且分類歸納，說明它在民間文學各種體裁中出現的情況，無疑是一部孟姜女故事流傳過程的編年史，成了該題目研究史上罕見的一種專著。

李福清研究方法的特點是佔有資料力求詳盡，分析和處理材料力求細緻，面面俱到，作深廣的開掘，然後從小題目的論析，逐步提升到學術上的大道理，即所謂“由小見大”，從孟姜女故事一個具體題目，得出中國民間文學流傳上的一般規律和總的理論問題的結論。

這樣做的效果也是很明顯的，令人感到資料翔實，論說有據，可以信服，而又不囿於一個題目的範圍，可以看清一類學術問題的總規律。

其一，我們從書後附錄的參考書目查看，除了路工《孟姜女萬里尋夫集》（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5年）所用資料外，還有我國的同行研究者未曾用過的許多材料。他共用四類材料：

1. 散文體傳說，計有刊本五種和鈔本二種。分別採自《民俗》、《民間月刊》、《山東民間故事》（1937）、《民間故事》（1929）、《中國民間故事》（1958）等刊物和書中的不同內容的《孟姜女故事》，還有陝西省文聯鈔本的《宜君縣哭泉鎮一帶關於孟姜女的傳說》。
2. 民歌，計有刊本和鈔本各六種。有來自己出刊的湖南、甘肅、新寧、常州等地的孟姜女民歌，有江西、四川、浙江、河南等省文聯和內蒙古文聯的當地孟姜女民歌鈔本，還有湖南孝歌《孟姜女送寒衣》等。
3. 說唱本，計有刊本六種和鈔本二種。其中有“寶卷”的，有文明大鼓書、鼓詞，還有河南墜子和福建評話的孟姜女唱本。
4. 戲曲，有刊本二種、鉛印本三種和鈔本九種。如雲南省滇劇團、江西省贛劇團、

北京市戲劇編導委員會等單位鉛印的孟姜女地方戲。分別由七個省文聯提供的鈔本九種如：南昌採茶戲、湖南湘鄉花鼓戲、山東茂腔、山東二夾弦（荷澤新藝劇團）、川劇以及長沙市花鼓戲等的孟姜女地方戲。

他選擇材料的方法是兼顧古今各種資料，不但書面的，而且口頭流傳的，凡與孟姜女有關的各種體裁的材料統統搜集起來，加以利用。

其二，有豐富的材料為基礎，李福清就可以對研究課題進行深入探索，多方考察，窮追究竟。正如他的導師契切羅夫所指出的：“研究工作要從小題目開始，題不要大，但挖掘要深”（《作者自序》第3頁）^⑧。這個特點同樣在李福清的這部專著中表現得很清楚。只要列舉它的章目就足夠說明：

- 第一章 孟姜女傳說的研究
- 第二章 古代關於杞梁妻的傳說與孟姜女故事
 - 遠古文獻中杞梁妻的形象
 - 古詩中杞梁妻的形象
 - 漢代散文體作品中有關杞梁妻的傳說
 - 樂府中有關萬里長城的題材
 - 四一七世紀詩歌裏關於長城的傳說
- 第三章 唐代記載的孟姜女傳說（七一十世紀）
 - 文史典籍中的孟姜女傳說
 - 敦煌資料中有關孟姜女的民謠
 - 變文裏的孟姜女傳說
 - 唐代詩歌裏有關萬里長城的題材
- 第四章 宋、元時代所記載的孟姜女傳說（十一十四世紀）
 - 宋代民間藝人的創作
 - 宋代文人作品中的孟姜女
 - 十二—十四世紀關於孟姜女的戲曲創作
- 第五章 明代關於孟姜女的傳說（1368—1644）
 - 有關萬里長城的歌謠
 - 明代戲曲裏孟姜女的形象
 - 作為典範的孟姜女的形象
- 第六章 清代關於孟姜女的傳說（1644—1911）
 - 寶卷中有關孟姜女的作品
 - 子弟書中有關孟姜女的傳說
 - 鼓詞裏的孟姜女
 - 彈詞裏有關孟姜女的傳說
 - 清代民歌和戲曲裏的孟姜女形象
 - 歷史文獻中關於孟姜女傳說的題材
- 第七章 現代記載的孟姜女傳說
 - 散文體傳說

關於孟姜女的抒情敘事歌

關於孟姜女的戲曲作品

李福清在作了這樣細緻的歷史考察之後，就得出有根據的結論：（1）中國民間文學最富有生命力（孟姜女故事流傳了13個世紀，經久不衰）；（2）人民所喜愛的故事情節往往有各式各樣的表現形式和體裁。

正如作者所說，專著解答了他預設的兩個問題：1. 一個故事情節在口頭傳說中可以存活多長時間；2. 一個故事情節在各種體裁中的不同表述。第一個問題俄羅斯或其他西方民族的材料無法解決，因為沒有像中國那麼久遠的記錄。他把敦煌孟姜女變文的情節與現代流行的民間孟姜女故事加以比較，發現該故事至少存活了1000多年。

第二個問題，鑒於中國漢族民間文學有一個特點：同一個情節（plot）在各種體裁中反復出現，如孟姜女故事，有民歌，有鼓詞，有彈詞，有寶卷，還有地方戲等等，可以研究這個題材在各種體裁中情節如何變化，如在傳說中孟姜女到長城的行程敘說得很簡略，而在戲曲裏則很詳細，因為在戲曲裏，可以用各種唱腔表達人物的感情。後來他瞭解到，廟裏常演孟姜女戲，因為她走路與死人去陰間相似^⑨。

有了這樣的研究基礎，李福清就能有根有據地對中國的同行學者，從老前輩顧頡剛到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民間文學史》（1958年）的作者們提出質疑、論駁，甚至指出某些人的若干謬誤。這是這部專著的另一個特點，也是李福清引起我國學者重視的一個重要因素。

（二）比較研究

以前很長一段時間裏，我國學術界曾以為蘇聯的文藝評論乃至學術研究都是只談思想內容不講藝術形式和藝術性，甚至是仍然實行庸俗社會學的分析方法。往往一言以蔽之，曰“教條主義”。這是看了50年代翻譯過來的文章後產生的印象。殊不知近來已大有改變。我們不能說有上述弊病的論著已經絕迹。不過，自從20世紀50年代“解凍文學”思潮產生以後，文壇空氣變換，文藝界重視藝術性已蔚然成風，文學批評和文藝理論界對藝術性、藝術方法的理論問題也作了比較切實的研究。不但有俄國的現實主義理論問題，而且有西方的藝術理論、藝術方法論問題。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文學界對形式主義的研究方法也發生了強烈的興趣，有使用結構主義的、符號學的和信息論方法的；心理學、社會學、價值學等觀點的文藝著作也有不少種類問世。李福清的神話專著成書於70年代，恰好是這種變化的一個鮮明的例證，尤其是普遍使用比較分析的研究方法，它表現在論析中國神話的兩部專著中。

1. 用結構分析來作比較研究。他的博士論文即專著《中國的講史演義與中國民間文學傳統——論三國故事的口頭和書面異體》（1970）^⑩就是成功的例證。三國故事在作家文學作品和民間文學各種口頭創作體裁中有多少變異，該書通過對比研究，便顯得極為清楚。

他用結構分析的方法，把一個故事（段子）分成若干最基本的情節“成分”——包括時間地點（或場面）、人物（多少）、動作、彼此發生的聯繫等，即“情節素”。同一個故事的其他異文、異體也劃分成細小的情節素，然後放在一起對比研究。這樣，內容相同的故事，其表現手段（藝術手法）的異同，就看得很清楚。李福清獨具匠心，

也使人明顯感到用結構分析的方法來比較研究作品的藝術手法會更加切實。

即以諸葛亮看周瑜的故事為例。

他把《三國演義》第49回的這一段子分成26個情節素，而在民間說書藝人的講本中，這同一段子分成的情節素數目大不一樣，揚州的康重華是109個，蘇州的唐耿良是60個，蘇州的陸耀良是93個。從對比中看出，說書人講的基本動作均來自《三國演義》，但在講的過程中，結構發生了變化，有的段落被捏合，有的被展開。加強了描寫性，尤其是人物內心的描述。增加間接引語、插敘等口頭說書時所必須的藝術手段。結果作品當然就擴展開來了。

李福清用結構分析法不但說清了書面文學對口頭文學的影響，而且具體探明了書面文學是如何利用民間文學中的情節、藝術手段以及語言的。

然而作者並不限於表現形式上的研究，而是仍然要談思想內容。他所實行的系統研究方法，就是把作品當作一個系統，從思想內容、語言以及其他各種表現方法都加以研究。應該說，結構分析和系統分析是他進行比較研究時在方法論上兩個最值得指出的特點。

2. 從形貌的前後變化來作比較研究。他的另一部專著《從神話到章回小說——中國文學中人物形貌的演變》(1979)^⑪。據作者說，他從神話人物（伏羲、女媧、神農、大禹等）開始，包括七種宋元平話，直到《三國演義》和明代的神話小說，都作了比較研究，主要論題是探討人物外貌描寫的演變，從動物形態、半人半獸形態到完全的人身外貌，研究小說人物怎麼保存古代人物的某些外貌特徵^⑫。

該書的特色，正如馬昌儀所概括，是從人物肖像描寫入手追蹤中國章回小說的緣起。“中國小說向以肖像描寫見長，歷代評家、注家（如胡應麟、馮夢龍、金聖歎等）對此有過許多精采的評述。對於三皇五帝以及其他帝王的相貌特徵，史書、緯書、歷代筆記小說中也不乏記載。但是，專門從人物的肖像描寫入手，對自遠古神話開始，到十四——16世紀講史演義與章回小說中的人物形象特徵進行歷史的、全面的考察，揭示二者的淵源關係，從邏輯概括的角度展示人物形象以及藝術思維的發展演變過程的，却自李福清始。《從神話到章回小說》把我們帶進一個嶄新的、過去極少有人涉足的領域”（第9頁）^⑬。

該書的《人類始祖伏羲女媧的肖像描繪》一章，對伏羲和女媧肖像的分析便是突出的例子，也是該書的重要內容。作者在“審視起於太古時期、止於古代的講史演義中的人物肖像”後，得出結論：“中國對文化英雄的理解通常表現在對神話人物的肖像描寫上。”而其變化過程為“神話性英雄從獸形變為人獸合形，最終變為完全的人形”（第73頁）。

此外，“古代神話人物的肖像屬於典型的表態描寫”，然後發展到後期，在“章回體的講史小說中，就有了情態肖像”，“這種肖像情態的加強，是文學中已具有個性特徵的現代型英雄人物的概括反映的萌芽”（第74、76頁）。

這裏還有一件趣事值得一提。李福清幾次談到，他研究神話人物肖像，是受了北大教授季羨林先生一篇文章的啓發。季羨林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正史裏的印度傳說》(1949)^⑭一文中曾引用《春秋緯合誠圖》所載一則材料：“伏羲龍身牛首，渠肩達掖，

山準日角，歲目珠衡，駿毫翁鬣，龍唇龜齒，長九尺一寸”，認為“緯書時代所記大人物像貌奇異怪誕，事實決不可能有的”，都是從印度傳說中來的。李福清由此注意神話人物像貌，進而去查緯書，終於有兩大收穫。一是發現了緯書的妙用。他說在其他古籍裏“沒有找到古代中國人想像伏羲外貌的任何線索”（第18頁）^⑤，而緯書中“提到的神話未必是緯書作者們想出來的，極有可能是他們……採用了起源於古代神話和傳說的傳統觀念”。這樣，緯書“對於我們這個論題特別有意義”，因為“緯書……提供了從伏羲開始的神話人物的更詳細的形象描繪”（第19頁）。二是發現了伏羲這位“始祖的純獸形形象”（第19頁）。他進而闡明，中國許多神話始祖在他們以人形或人獸共體出現以前，都經歷過一個純獸形階段。這無疑是重大進展。

正因為廣泛分列排比了豐富的神話資料：典籍神話，活神話，文獻的，書面的，口頭的，文學的（小說、講史、演義、平話、說唱文學），藝術的（墓雕、石刻、壁畫、年畫、插圖等）神話，在此比較分析的基礎上他纔能把中國神話從總體上分成四大體系：一、中國遠古神話，借幾部古籍中的（片斷）記載得以重構，其特徵之一是“神話人物的歷史化”，神話人物“被闡釋成上古的歷史人物。地位顯赫者成帝王，次之為臣相，餘則類推”。作者說：“神話英雄的人化是中國神話所特有的現象，而神話的歷史化加速了這一人化的過程。”（第84頁）二、道教神話，西元初年“道教哲學家把古代民間崇拜與薩滿信仰熔於一爐，演變為宗教”。他們按自己需要吸收某些古神話形象（黃帝、西王母）。認為蓬萊、方丈、瀛洲這三個神山的傳說，“其觀念是從中國遠古神話中借用來的”，又說道教神話的主人公主要是“形形色色的驅鬼道士”和“成千的仙人”以及“各路神祇”。他們受轄於三種抽象而神秘的象徵：太初、太素、太易，後來逐漸人化，“變成老子、黃帝和盤古”（第92、93頁）。三、中國佛教神話，“公元初年佛教連同一整套發達的神話體系自印度經中亞傳入中國”，它“適應中國條件的需要”，“利用了中國古神話的某些情節，逐漸出現了一批以中國人為主人公的佛教人物，如觀音菩薩”等。還有，“在中國，對地獄及名目繁多的審判的細節描寫，則是佛教影響的產物”（第93、94頁）。四、後世民間神話，即“形形色色古老的或再生的民間信仰”以及“儒家所信奉的聖人以及全國性或地方性的各路英豪”，與遠古神話人物的歷史化過程相反，“各式歷史人物經歷了神化的過程”（第94頁）。而且，“十世紀末，中國原有的幾個神話體系日趨融合”，“把道教、佛教、民間神話以及儒家所信奉的英雄聯合成一個統一的體系”（第95頁）。

此外，近期在論述臺灣原住民的民間文學中，也還是採用了比較分析的研究方法。他從1992年應邀到臺灣清華大學講學起，用了六、七年時間調研資料，分析研究，完成了一部專著《從神話到鬼話——臺灣原住民神話故事比較研究》（1998）。據作者說：“在這本書中，我把臺灣原住民神話和民間故事與中國大陸各族及菲律賓、大洋洲民族神話作比較，有些神話從黑龍江兩岸少數民族到臺灣許多民族都有，如射太陽神話，雖然羿射日神話記載很早，但作比較研究可以證明古代中國后羿神話不是原始的，是在人類發展的較發達階段形成的。”^⑥

不但如此，在早期他就依據比較的方法發現過《紅樓夢》在我國已失傳了的一個抄本。“1963年初，我到列寧格勒東方研究所，看到我的同學、好友孟列夫在整理那裏收藏

的敦煌文獻。孟列夫說他發現了新的變文，還有其他友人說發現了別的文獻。我很羨慕他們。夜間睡下，我就想，我是否也試着作一點調查，也許能發現什麼孤本。我拿孫楷第的《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作比較，看看我們是否有在中國和日本沒有保存下來的古典小說版本。第二天到東方研究所，馬上發現了1832年一位留學生庫爾良采夫從中國帶回的《石頭記》八十回抄本。1986年，這部書由中華書局影印，稱為‘列藏本’。”^⑩

（三）田野調查

應該說，李福清從進入中文專業起，就學習和養成了重田野調查的優良傳統。從當年千里迢迢由彼得堡橫跨歐亞大陸來到中蘇邊境的東幹族居住區採錄民間文學，到近年由俄國遠渡大洋到我國臺灣島採集原住民的口頭文學創作，他都認真做著這項腳踏實地的工作。他回憶當年說道：“1950年我進入列寧格勒大學東方系，開始學習中文。那時沒有中國老師，沒有會話課，主要是讀書，天天讀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有一天，我在中文教研室看到一個人，像漢族人，但又有些異樣，係‘東幹人’。原來他們是居住在蘇聯中亞地區的吉爾吉斯和哈薩克兩個加盟共和國的中國甘肅、陝西回族移民的後代，其祖先是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遷居到這裏的，甘肅來的說甘肅話，陝西來的說陝西話。我馬上產生一個念頭：利用暑假去學口語。”

“我來到一個甘肅回族人居住的集體農莊，叫米糧川。與農民一起勞動，學會話。第一次聽到各種中國的民間傳說、民間故事和民歌，如姜太公賣面、孟姜女哭長城、韓信傳說、‘男學生與女學生’（即梁山伯與祝英臺）等。由此，我對中國民間文學發生了興趣。我把他們的傳說、故事和民歌記錄下來，回到列寧格勒大學，在圖書館找材料，但所獲不多。1953年和1954年，我又去了中亞，繼續學習甘肅話、陝西話，並且專心搜集民間文學的口頭資料，作記錄既用拼音，又用漢字。大學的年級論文和畢業論文，我用上了搜集的這些材料，四年級的論文是《東幹傳統民歌初探》（1956年在《蘇聯東方學》發表）。五年級畢業論文是《中國成語、諺語和歇後語》，既參考中國出版的書籍，也用了自己搜集的材料。1958年在科學院《東方研究所簡報》發表的《韓信傳說——東幹人中流行的中國歷史傳說之一》，把我在米糧川記錄的傳說與書面材料作了比較研究。此前，除了廣州1929年《民俗》周刊66期第6—8頁，發表過張冠英《傳說與史實——關於蕭何、韓信的傳說》之外，沒有關於韓信傳說的記錄，我的記錄可以說是最早的。1977年，我與兩位東幹學者合作，選編了《東幹民間故事傳說集》，由莫斯科科學出版社出版。我用我記錄的《白袍薛仁貴》與平話《薛仁貴征遼事略》、章回小說《薛仁貴征東》、薛平貴戲作比較，探討了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發現一些故事情節由平話演變為小說，從小說演變為說書，又從專業的說書返回到民間流行的故事這樣一個有趣的循環發展過程。”^⑪

至於赴臺灣的調研，他說得更為形象和充滿艱辛，我“研究臺灣的原住民（大陸總稱高山族，實際上是9個不同的民族）民間文學，到臺灣之前，我對那裏的原住民差不多是一無所知，後來我從調查布農族開始，發現布農族民間文學非常原始，比臺灣其他原住民還原始。布農族沒有什麼神，直到日據時期部落也無頭目，他們不但跟其他臺灣原住民一樣沒有笑話、謎語，甚至連諺語也沒有，民間故事也很少，有時可以看到由神話演變出來的民間故事。他們的神話故事情節簡單。我一共搜集了一百五十個神話

故事，後來我又調查了原住民部落，寫了一些文章。”^⑩

李福清氏對中國懷有深厚的感情，他自取了中國名字就很能說明問題。這個名字在我國已經傳開，為學界所熟知，以至於人們不大注意他的俄文原名 Борис Львович Рифтин，翻譯過來應是鮑里斯·李沃維奇·里弗京。他1932年出生於列寧格勒（今彼得堡）的一個職員家庭，1955年畢業於列寧格勒大學東方系中國語文科，分配到莫斯科蘇聯科學院（今俄羅斯聯邦科學院）世界文學研究所工作至今，專事中國民間文學和中國俗文學的研究。1965—1966年在北京大學進修，1961、1970年先後獲副博士、博士學位，並先後升任該所高級研究員和主任研究員，1987年12月23日當選為科學院通訊院士。如今已是俄國漢學界文學領域學銜最高的人。對中國文化的熱愛和執著，則是他獲得巨大成就的一個重要動力。

還有一點，是他謙遜治學的態度。不但師承前輩的傳統，而且注意學習同輩，甚至晚輩的長處。他經常來往交流學術信息，訪華之行不下20次，大多數情況下我都能同他見面，而每次見面，對於俄國漢學界的新進展，出過什麼新著作，有什麼樣的新人，他都能侃侃而談；對於別人的新成果，他能如數家珍，不僅介紹其要點，還能指出其新發現、新見解，有時還能順手送你得之於別人贈閱的新著或新資料。總之處處令人感到他對於同行事業的關注，誠心誠意肯定別人的進步。從別人的成就中汲取動力和營養。這也許是他成就更大的另一個原因。

注釋：

- ① 參閱李明濱：《中國與俄蘇文化交流志》第六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 ② 參閱李明濱：《中國文學在俄蘇》第五章，花城出版社，1990年。
- ③ 曉蓉：《王蒙盛讚中國當代文學國際討論會》，《文藝報》1986年11月29日。
- ④ 李福清著，馬昌儀編選：《中國神話故事論集》，鍾敬文《序言》，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8年。
- ⑤ 李福清、王樹村、劉玉山編選：《蘇聯藏中國民間年畫珍品集》，人民美術出版社，1990年。
- ⑥ 同注④，《編者序》。
- ⑦ 見《中國神話故事》，274—295頁。
- ⑧ 本節中的頁碼均見於《中國神話故事論集》。
- ⑨ 李福清著，李明濱編選：《古典小說與傳說（李福清漢學論集）》，中華書局，2003年，2—3頁。
- ⑩ 中譯本書名：《〈三國演義〉與民間文學傳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7年。
- ⑪ 該書《作者的話》，第一章《人類始祖伏羲女媧的肖像描繪》、《結論》的中譯文見《中國神話故事論集》，13—83頁。
- ⑫ 《古典小說與傳說》，5頁。
- ⑬ 本節中的頁碼均見《中國神話故事論集》。
- ⑭ 《中印文化關係史論叢》，人民出版社，1957年，87—94頁。
- ⑮ 本節中的頁碼均見《中國神話故事論集》。
- ⑯ ⑰ 《古典小說與傳說》，8頁。
- ⑱ 影印本書名：《蘇聯列寧格勒藏抄本〈石頭記〉》共六冊，中華書局，1986年。
- ⑲ 《古典小說與傳說》，2頁。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東語系）